

## 一、前言

「民粹主義有一個基本“困惑”：其基本姿態是拒絕面對局面的複雜性，而將之簡化為一種與偽具體化的“敵人”的清楚的鬥爭（從“布魯塞爾官僚”到非法移民）。因此，從定義上來講，“民粹主義”是一種否定現象，一種建立在拒絕之上的現象，甚至是一種不明說的對無能為力的承認。我們都知道一個老笑話，說的是一個人路燈下找他丟失的鑰匙；當被問到在哪里丟了鑰匙時，他承認說是在後面那個黑暗的角落裏；可是，為什麼他要到街燈下來找鑰匙呢？因為這裏比較亮……民粹主義當中就有這種把戲。」(Zizek, 2007／查日新譯，2007)

近年台灣的發生多起隨機殺人事件，而也隨之牽動了廢除死刑的議題。廢死議題在台灣爭論多年，而爭論已經隨著重大刑案的發生而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這樣的爭論未必代表著台灣對於此事件的關注，甚至相反，這樣的爭論正代表著社會大眾的恐懼與無所適從。

先介紹本文要分析的對象：「小燈泡事件」<sup>1</sup>。該事件為發生於 2016 年 3 月 28 日的隨機殺人案件，王姓兇嫌持著自己剛剛購買的菜刀，騎著機車在內湖街上隨機挑選對象，最後在母親面前，已殘忍的方式殺害小名為「小燈泡」的 4 歲女童，震驚全台。

這起事件引起了巨大的波瀾，在這之前，台灣近年最為轟動的「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也用類似的形式震懾了社會，在台灣最為自傲的文明、進步象徵「捷運」內，用簡單的刀械，傷害了與他毫無瓜葛的數名路人。王姓兇嫌，則是在台灣資本主義繁華象徵之一——美麗華旁的住宅區，於母親面前以「斷首」方式殺害女童，可說是為台灣社會再次創造了一種新的恐懼形式。

刑案在台灣並不是新鮮事，但很少有刑案會讓我們如此懼怕。無論是在你沒得逃的捷運車廂，還是你毫無防備的自家巷口，這樣的兇案不但找不到誰可能是兇手，也無法預測何時會發生，更可怕得是，兇手甚至並不是針對特定個人，而是社會整體！

為了要探討這樣的事件，接下來的部分，我會從兩位哲學家對於恐怖主義的討論開始。而本文的重點將不會放在事件本身，而主要會關注在該事件引發的網路論述，以及其背後運作的快感邏輯。分析的客體主要是台灣 BBS 站 PTT 的最大討論版 Gossiping 與小燈泡事件的相關的討論串，以及使用搜尋引擎篩選出轉發到其他板上的討論串。

---

<sup>1</sup> 關於事件詳細說明，可參見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6%E5%B9%B4%E5%85%A7%E6%B9%96%E9%9A%A8%E6%A9%9F%E6%AE%BA%E4%BA%BA%E4%BA%8B%E4%BB%B6>

## 二、「將臨」的恐懼：恐怖主義與隨機殺人

創傷如同武器，會產生傷口，並永遠留下無意識的傷疤；然而這個武器極為恐怖，因為來自「即將發生之事」，來自未來，且是一個極為極端的未來，甚至抗拒所謂「未來居先」(future anterior)之文法。...X 受到了創傷？(X 絕不可能只是美國，很可能就是所謂的「世界」) ... 不，X 是被不存在之未來所傷害，但不是此時此刻或栩栩如生的過往，是因為此卓越國家的權威首府可能再次受到傷害——而你永遠無法確定。

(Derrida 語，引自 Borradori, 2015 / 葉佳怡譯。)

我們或許可以說，全球恐怖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全球範疇的隨機殺人行動。不單是因為兩者的憤怒是針對集體，大多與其物理上所傷害的對象個體無關，而且兩者在社會上造成的創傷反應其實非常相似，這也讓我們在討論時可以借用一些討論。

Massumi (2010) 在〈The Future Birth of The Affective Fact :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Threat〉一文中，描述了一種「先發制人」的行動狀態 (Preemptive action)，我覺得可以做為本文所描述狀態的一個進入點。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媒體環境塑造出一種「未來的威脅」，透過各式各樣的恐怖威脅，包括窩藏恐怖份子、藏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炭疽熱的威脅等「潛在的威脅」。這些威脅在當下永遠都是潛在的，可能只有微小的現象，但卻有個非常明確的未來：恐怖份子造成世界騷亂、家園不再安全、甚至是過度肥胖、身體病變...，這些明確的「未來」的作用，並不一定是引導解決問題，而是引導國家力量介入人民的生活之中。

在明確的威脅之下，永遠先發制人就是必要的，而「先發制人」的行動狀態便將「國土安全」與「軍事行動」、「攻擊」與「防衛」的界限給模糊了。這樣的威脅在一個缺乏「實質指涉」的客體之下，成為無限上綱的「自我防衛」，恐懼與威脅「永遠」潛伏在四周。

Dunmire (2005) 研究美國總統小布希對外的演講稿的研究中，便描繪出這樣的政治修辭學如何構築出一個明確的二選一的未來：軍事介入伊拉克、「製造」民主自由...；或是等待伊拉克恐怖份子的 WMD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在美國本土落下。說穿了，白癡都知道該選哪個。這樣明確的未來便是國家機器介入的最佳理由。

但若僅僅是「先發制人」這一概念，對於討論隨機殺人的論述仍是不夠的，因此我們接著要加入 Derrida 在談論恐怖攻擊時談到的「自體免疫危機」概念。

在與 Habermas 共同被訪談的書《恐怖時代的哲學》(葉佳怡譯, 2015)

中，Derrida 論述後 911 現象的概念「自體免疫失控危機」<sup>2</sup>，可以更具體的構築這樣的結構。

「自體免疫失控危機」的意象來自動物的生理病理學。免疫系統為個體為了保護自身不致毀滅而演化出的防禦系統，但這詞會其實也不單是「正向」的，他有時也會是個「麻煩」，例如移植器官時。(葉佳怡譯, 2015:149) 而 Derrida 在此便借用了這樣的意象，表達來自內部的恐懼。恐懼總是具有內部性，恐怖主義讓我們憶起了即使在「國際」，敵人也「總是」寄居於內部。

冷戰後遺留的問題造成了恐怖攻擊，但隨著冷戰的消失，過去被用來推動國家力量控制的威脅找不到適當的他者也消失無蹤，但被一片祥和的氣氛所掩蓋過的矛盾逐漸演變成了恐怖攻擊，我們面臨了全新的威脅。「他者」消失在我們的視野內而成為了「我們」之一、內部的、全面性的、無臉孔的對象。所謂的「自體免疫」，即我們在我們的世界內尋找敵人。所以我們在街上群找包著頭巾的中東面孔，把他們關入關達那摩監獄，好似能夠暫緩這樣的傷痛，但卻又清楚的知道事情尚未結束。

911 事件並非是結束，而是開始的宣告。媒體不斷透過畫面以及「複誦」911 造成的「恐懼」(其實也是反復確認我們承受的住)，更是讓這樣的恐懼成為了來自「未來」、「將臨」<sup>3</sup> 的「創傷」。這段概念先保留，我後面會有更詳細的討論。

於是這道創傷被當作了開啟未來的鐘聲。人們並沒有開啟悼念的程序，而是將創傷化為毀滅性的武器。西方盟友藉由宣告對恐怖主義的戰爭開打，展開了一場「對抗自己的戰爭」。所謂的對抗自己，一方面是以武力收拾冷戰時期西方對於中東地區的介入，另外一方面卻是在中東地區展開新的介入。「所有的恐怖主義，都是為了回應另一個恐怖主義所展開的行動」(葉佳怡譯, 2015)，為了周全本土而在外地造成的傷害，勢必將化為更多在本土的傷害。而這傷害的循環，便是自體免疫的最大危機。

到這邊我們可大略的整理出恐怖主義創造的恐懼的樣態。所謂先發制人，其實就是「對於恐懼的反應」，而這反應往往是過度的反應。而「自體免疫危機」所點出的便是恐懼的「不可預期」與「內部性」，而這樣的不可預期與內部性，創造了一種持續的恐懼，用 Derrida 的理論術語來詮釋之，便是「將臨的恐懼」(Terror to come)。

恐怖主義相關的理論論述至此，我們可以回頭審視「隨機殺人」的案件與恐怖主義行動的兩者異同，並在此點出一項最大差異：那便是攻擊者所對抗對象的微妙的差別。許多恐怖主義者的行動，我們都可以明確的看出目的，也就是對西方政權的不滿。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在冷戰時期對於中東地區的政治介

---

<sup>2</sup> 原文為「自體免疫過程」(autoimmunitary process)，我為了加強這一來自內部的失控意象，因此略修正為「自體免疫失控危機」。

<sup>3</sup> 在這裡 Derrida 玩弄了法文的「未來」("avenir")，以此宣稱了一種「將臨」("à venir"，英文寫做"to come")的概念。(葉佳怡譯, 2015)

入造就了許多壓迫，而這些壓迫如今捲土重來，對象非常清楚，便是西方霸權的帝國主義政權。但隨機殺人者卻不同，隨機殺人者的對象是社會整體，並不能簡略的化約為是政府。恐怖主義對象之所以是政府，是因為他所處的生活環境壓迫的來源是國際的，而在國際場域中，國家便是主體。但對於隨機殺人者而言，壓迫來源卻是他所無法逃離的生活周遭，並非特定對象，而是在國族國家的框限內人群集合，也就是「社會」。

簡略的回首過往的台灣隨機殺人者的面貌：男性、青年到中年、失業或是低薪工作、或許有精神疾病的病史、...等等，這些與我們所認知的「危險人物」和「失敗者」形像其實非常接近。而也是因為此，社會的壓迫總是無止境的向他們襲來，這也是許多民代或官員鏗而不捨的嘗試要將「無家者」驅趕出社群的原因，可謂十分「善意」的出發點。

在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台灣社會，其實要找到這樣的人並不難。我們深信不移的競爭邏輯從牙牙學語時便開始篩選成功者，每一個往社會的理想踏出的人都踏過了千萬顆人頭，也因此，我們的社會充斥著「魯蛇」。在社會上的競爭失敗，人際上也不盡如意，經濟的失敗連代生活上遭遇困難之下，可能隨機殺人的主體輕易的便誕生了。

而這層對於社會的恨意，政府充其量只能算是幫兇，真正的壓迫者是更為廣大的社會象徵秩序，而觸發這套先發制人的「免疫危機」邏輯的也是這套象徵秩序。於是，這套激烈的反應在台灣社會的脈絡之中，便接合了既存的一套對抗邏輯：「廢死爭議」。

### 三、對抗快感與強迫性重複

我要先解釋一下本文所談論的對抗（antagonism）。

Laclau and Mouffe（1989）的著作《文化霸權與社會主義的戰略》中，展開了「對抗」這一概念作為開發政治性潛力的政治策略。以 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為基礎，Laclau and Mouffe 發展了一套以「接合」的實踐為基礎的意識形態對抗理論，將 Gramsci 的霸權理論蘊含的本質主義刪去，強調對抗框架為一差異體系，將左翼社會運動的鬥爭從階級為主的本質主義中解離<sup>4</sup>，用多元決定的方式重新描述社會，開展了後結構主義的基進民主學派。

但所謂「對抗」框架並不能化約為：只要創造了對抗，便能推動社會前進。但在一些狀況中，也會進入意識形態封閉（ideological clouse）的模式，加劇僵化的社會對立。張維元（2015）在〈『平行共謀式對抗』的快感新陳代謝〉一文中，以拉岡的快感分析理論來詮釋了一種政治對抗激化後進入意識形態封閉的狀況，也就是所謂的「平行共謀式對抗」。

所謂「平行共謀式對抗」這種對抗形式，描述的是在過度激化的政治對抗模式之中，雙方形成一種「互不對話」的對抗形式，且「欲罷不能」。相互對抗的主體在這樣的對抗之中，快感油然而生，形成快感層次上的共謀。

有趣的是，主體在這樣的對抗之中，如何獲得快感？拉岡式的主體，往往受困於與大對體的複雜快感謎題之中。而此時，神經質的快感策略是非常容易被啟動的。所謂神經質主體的快感，是透過小心翼翼的跟隨大對體中的「模範」（成功人士、名人）、遵守社會中或隱或顯的各種規範；但另一方面，卻又常常進行「僭越性實踐」，包括偷窺（那個被大對體禁制的空間）、違規（做那些大對體不讓我做的事）、看知名人士出糗等，嘗試著從大對體（這裡的角色更像是「把快感藏起來的混蛋」）手中把快感偷回來。神經質主體這種看似矛盾的快感策略，表現出的正是面對快感的不知所措與焦慮（張維元，2015）。且踰越大對體之後真正的問題：「罪疚感」還在後頭，主體便在這樣的焦慮之中，享用快感，進入愛恨交織（ambivalence）的狀況。

而處於對抗中的「邪僻主體」（“Perversion”一詞原譯為「錯置」、「倒錯」的，但張維元於文中為了彰顯這樣善惡交織的狀態，將這樣的主體快感運作特別譯為「邪僻」快感，因此這邊延用。）卻透過邪僻策略的快感運作跳脫了此一問題：主體透過想像自己與大對體和想像性律法（在這裡可以形容為決定「善惡」的規則）的緊密關係，進入了「自我恭賀」的主體狀態。

在拉岡理論的脈絡中，主體面對的他者有兩種，一種是客體小 a(Object petit a)，另一種則是大對體。大對體為主體慾望的投射點，是一套鬆散的語言符號、規則、實踐排列而成的象徵秩序，或許也可以形容主體無意識中的社會樣

---

<sup>4</sup> 這部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脈絡中充滿爭議，號稱「後馬克思主義」的 Laclau and Mouffe 也因為在理論中放棄階級而被視為背離馬克思主義重視經濟基礎的傳統。但這在本文中不是討論的重點，因此用註釋簡單提要。

態。而邪僻主體的快感策略便是將大對體中的片段，拜物化的挑選出一小片來「完全代表大對體」。而這樣的一小片，有的拉岡學者稱之為「想像性律法」(Rothenberg and foster, 2005；轉引自張維元，2015)。

當主體取出了想像性律法，主體想像自己「代表了律法」。主體開始要求大對體「多享受一點快感」，而不再是掙扎在僭越律法與罪咎循環的「痛病快樂者」，主體甚至可以「覆蓋整個關係場域，並分配良善 (Goods)」。無所不能的主體面對他者，施展暴力，在面對質疑時又可以退到律法後，聲稱自己不過是在「執行任務」。

在張維元的論文裡，他所描繪的是 2006 年台灣紅衫軍運動中政治對立的激烈場景。紅衫軍勢力的「清廉」與反紅勢力的「本土」，彷彿完全無法共存一般，兩者互相抓取對方的片段來詮釋自己眼中的「壞人」，如「紅」所象徵的共產黨，並以此指責對方「與中共掛勾」、用施明德對威權政府的求饒過程大做文章，用來指涉對方「沒種」；以及用遊覽車數量來暗示「反紅衫軍」是被官方動員的、用紅衫軍「人手一杯咖啡」來指責對方「不文明」。這些片段抓取並不是真的在指責對方，其實是在與自己的「想像性律法」對話，證明「我是對的，他們真的這麼壞！」

這樣的邪僻快感策略帶來的是獵捕「他者」獻祭的過程：邪僻主體尋找在場域中的「他者」，而向想像性律法「獻祭」。而張維元論述的「平行共謀式對抗」便是這樣的邪僻主體在政治場域上相遇對抗的狀況。主體在這之中獲得快感，形成快感層次上的共謀，因而進入一種「酣戰」的狀況，欲罷不能。

在這一小節目前為止的說明中，我們知道，當對抗一旦進入了前述的意識形態封閉 (ideological clouse) 模式，便使得論述的生產性在此中斷，對抗框架便轉向了「指責對方鞏固自己」停滯狀況。

而在這時，我們需要為回想一下前一節的說明。

對於恐怖份子，透過軍事行動來緩解我們對於威脅的恐懼與焦慮，而緩解的同時，這樣「過度」的行動讓我們因而走向了宛如「自體免疫危機」一般的困境：我們進入了傷害的循環。

但當對象從國際恐怖主義轉換為「在地的隨機殺人」時，面對這「將臨」的恐懼的反應會變得更加激烈。政府不再是仇恨對象，仇恨的目標轉向了社會整體，所謂的自體免疫危機也變的「完全內部化」，而先發制人的行動樣態也轉變成了存在於網路中的激烈反應。

而這便是這兩節理論的銜接點：所謂的平行對抗式的快感共謀，快感倒錯的邪僻主體，在本研究分析客體—「廢死爭論」之中的運作，是作為面對「將臨的恐怖」而引發的「強迫性重複」的症狀在展現的。這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論點。張維元的論文所提到的紅衫軍事件，對於政府以及現狀的不滿，被匯集到一個既存的對立框架—藍綠。但在小燈泡事件中，我們雖然可以發現對於情感匯聚到了對立框架之中，進入意識形態封閉的狀況中，但這並不是單純的匯聚，而是（拉岡意義上的）病理式的結構。

前述談到 Derrida 的論點時，談到「911 事件並非是結束」，而是開始的宣告。大眾媒體與官員不斷透過畫面以及「複誦」911 造成的「恐懼」（其實也是反復確認我們承受的住），更是讓這樣的恐懼成為了「來自未來」的、「將臨」的「創傷」。在精神分析中，重複創傷的過程是主體在嘗試「象徵化」創傷的過程。Freud 在《超越快感原則》（2000）一書中提出著名的「Fort-da 遊戲」，來指出「強迫性重複」這一精神官能症概念。小孩丟出並拉回線軸，嘗試要控制與母親分離的「創傷」。這是主體嘗試要將創傷「象徵化」的過程，透過「線軸」這一心理機制，嘗試理解並控制母親離開（拋出）的創傷，和母親歸來（拉回線軸）的快感的過程。而所謂的強迫性重複的精神官能症，便是主體在面對象徵秩序可能的匱缺及閹割時，表演一些儀式行為與重複出現的衝動性的想法來面對焦慮與恐懼。典型的案例便是 Freud 的病人「鼠人」，他試圖以一連串誇張的儀式來擋開所愛的人身上可能會發生不幸的事。而強迫性重複所謂的象徵秩序的閹割與匱缺——也就是鼠人所謂的「可能發生的不幸的事」，往往是展示在幻見裡的場景，而且在強迫性重複的狀況，呈現的往往會是場可怕的災難，所以主體會用盡一切去阻止這件事的發生。（Evans, 1996）以鼠人來說，他曾經在路上見到一塊石頭，在路過之後腦中仍不停的重複想像愛人被石頭絆倒、因石頭而發生不幸，讓他感到難受，最後折回去把石頭移開。周而復始的重複著恐懼與行動，便是強迫性重複的精神官能症<sup>5</sup>。

我們可以發現強迫性重複的狀態，與前述的狀況所產生的強烈交集。對抗狀態為何會出現快感倒錯的邪僻主體？張維元在論文的最後，談到平行共謀式對抗之存在並不能讓我們否定政治對抗的政治生產性，而是指出政治對抗確實可能變成意識形態一般的存在，而不是必然成為意識形態。而其中的轉捩點，或許會如張維元在論文中談到的，關鍵在於「其組構的方式」。

這也正是本文所希望呈現的重點。當政治對抗，碰上了「將臨」的恐懼形式，會是何等的噩夢？

---

<sup>5</sup> Freud 所論及的強迫性重複症狀，其實分成非常多種類的，包括厭惡、重複的想法、無法克制的行為表演（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但 Lacan 認為強迫性重複並不指向「症狀」，而是指向「結構」，所以將所有的症狀都歸類為典型的「強迫性重複」。本文在使用上較偏向 Lacan 的說法。

#### 四、小燈泡事件：被恐懼驅使的、倒錯的鄉民正義

→ #####: 誰跟你講是關心被害人，這叫復仇

→ #####: 復仇你不懂沒關係，等你或者你家人被殺了，就會懂了

Ptt, 看板 Gossiping, 2014 年, 網址 <https://disp.cc/b/163-714S>

噓 XXXXXXXX: 純噓樓上, 唯一有資格原諒的人被砍死了啦! 家屬有甚麼資

→ XXXXXXXX: 格談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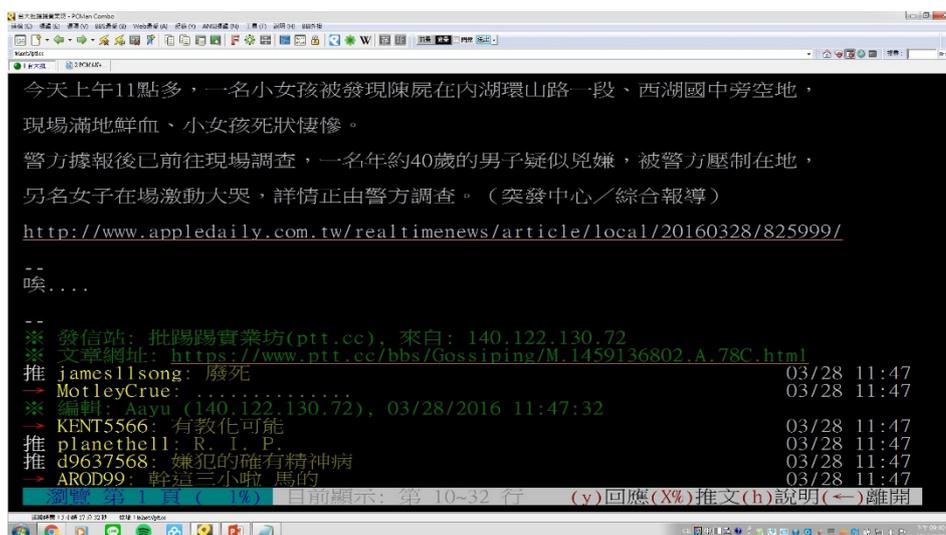
Ptt, 看板 Gossiping, 2017 年 文章代碼#10xsEank

廢除死刑的議題是近年台灣非常重要且討論量相當大的議題，具有相當的爭議性，且近年又因為社會事件與隨機殺人事件頻傳而一直被提起，連選舉時候選人對死刑議題的態度都成為重要的「戰場」。沿著「要不要廢除死刑？」這道核心問題可以展開各式各樣的論述，包括「死刑有沒有用？」、「誰可以決定誰該死？」、「為什麼國家要養那些罪人？」等等，交織成一道複雜的論述網絡。

隨著隨機殺人這樣的案件出現，廢除死刑的議題隨著先發制人「免疫危機」邏輯，逐漸轉換為「意識形態封閉」的對抗。隨著電影一般的案件戲劇性的上演，犯人沒有臉孔，我們只知道捷運車廂乃至自家巷口都不再安全，恐懼出現了全新的樣貌，廢死聯盟這樣邏輯上施惠於加害者，且常常以幫助加害人的角色在媒體版面出現的團體，便成為了場域中最顯著的「敵人」。

以小燈泡事件為主，我們便可以清楚的看到這樣的意識形態封閉。

3/28 上午 11 點近 30 分，發生「內湖隨機殺人」事件，也就是在內湖的大街上發生了「將兒童斬首」這樣恐怖的事情。在十分鐘內，蘋果就發布第一則即時新聞：



(圖一：筆者翻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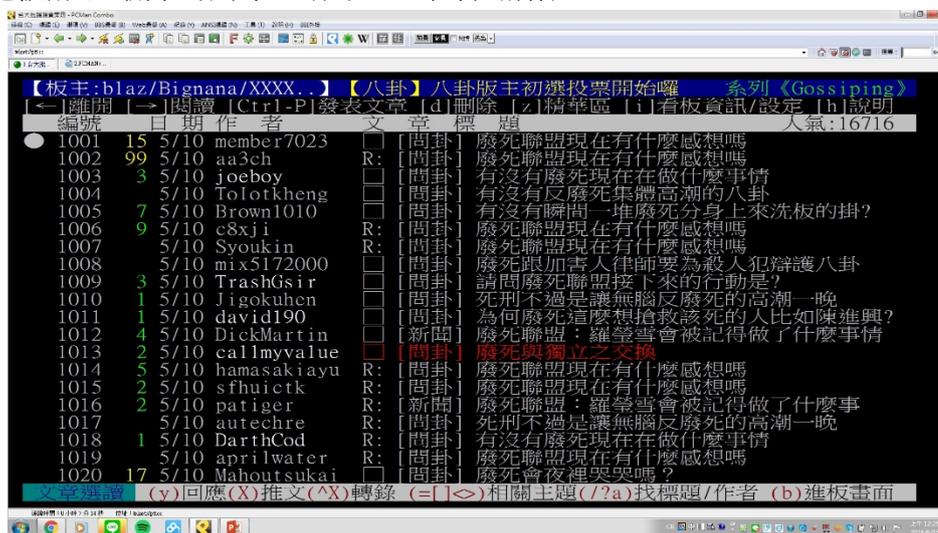
這時，「廢死聯盟」彷彿是「加害者」或是「保護加害者」的角色被點出，即使廢死聯盟根本尚未發布任何立場，甚至可能根本還不知情，僅有執行長以個人名義在數小時後在臉書哀悼，卻還是在第一時間被近乎「直覺」的「隆重」帶往戰場。

這樣的狀況其實到小燈泡的媽媽，發言後更加劇烈：

...我認為，這樣的隨機殺人事件，兇嫌基本上在當時是沒有理智的，這不是靠立什麼法，怎麼做處置，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還是希望能從根本，從家庭、從教育，讓這樣子的人消失在社會上面，讓我們的子子孫孫都不要再出現這樣子的人。<sup>6</sup>

冷靜的口吻、沒有誇張的哭鬧、對加害者的同情，種種的樣態讓反對廢死的一方彷彿遭到背叛一般，指責她「有病」、「矯情」、「跟洪慈庸一樣想選議員」，甚至有人稱她是「必娶媽」<sup>7</sup>。其實這些攻擊，除了來自被背叛的感受之外，更強烈的是來自於對於「想像性律法」的焦慮。受害者家屬的感受一直是反對廢死相當重要的論述，但小燈泡的媽媽卻跳脫了這個論述，做出了另外一種說詞，於是焦慮便產生了：「她跟我想的不一樣，一定是她不正常！或是居心叵測想紅！」

而在一個月後，鄭捷案死刑定讞當日和遭法務部突襲槍決這天，廢死聯盟更是被加以嘲弄的對象：(圖二：筆者翻攝)



而小燈泡的媽媽，也在此時做出了發言：

小燈泡事情之後，有很多人期待或努力迫使家屬要能有清楚的表態，支持

<sup>6</sup> 取自 PTT 〈女童母親受訪全文〉 <https://disp.cc/b/163-9k1U>

<sup>7</sup> 來自 PTT 文章 <https://disp.cc/b/163-9oPB>

死刑或是廢死？！我不是不願意表態，而是真的沒有想透...。

...鄭捷很快的就執行死刑，意即就這樣失去了一個研究與瞭解的對象，他死掉了，然後呢？繼續讓這樣的事情發生？繼續速速執行？從過往的訊息來看，鄭捷是想死的人，所以藉由殺人來讓自己死，這樣的結束如他所求，那有什麼意義？...。

國家是不是最少應該要給大家一個交代，好好剖析犯罪者以及整個事件的原因，給社會一個「理解」的機會，社會才有辦法走的更遠更好。唯有當我們瞭解這個人是怎麼一步步走向犯罪，我們才有機會談改善、談預防。否則，我們就真的只是永遠的活在一個未知的恐懼之中。

請問國家，執行死刑之前.....是不是應該先做完該做的功課？！<sup>8</sup>

這樣的言論更是引起軒然大波，雖然文中強調他並不想站立場，卻明白反對迫於民意之下速速槍決鄭捷的事件，更是罵聲不斷，甚至說「只是殺人魔剛好挑到你家小燈泡」。

立法委員蔡正元更是直言，「最近有個幼童遭割頸，身首異處的被害案例，其母親受過相當教育，卻也是廢死教徒」，而小燈泡媽媽「對鄭捷死刑的認知，和未來她對殺害女兒兇手的認知，才是值得研究的心理疾病案例」<sup>9</sup>。而議員王欣儀甚至在小燈泡媽媽受邀擔任司法改革委員後，質疑他「不像受害者媽媽」：

我的粉專貼文其實很簡單...以一個同是受害者家屬、又為人母的心情，平鋪直敘個人感覺『不像』一個目睹割喉媽媽寫給亡女的文，全文完全沒有任何『不好』、『不對』、『不行』的批評或辱罵；我尊重每個人的表達方式，也沒有好壞對錯。至於到底『像不像』？如果真有看完她臉書文的人，自有不同想法。<sup>10</sup>

直至 2017 年 5 月 12 日，王姓兇嫌一審判處無期徒刑，這則討論熱潮再次掀起，小燈泡的媽媽表示「對判決無意見」，「對於民眾非理性的批評兇嫌，深感痛苦」，更是引起諸多批評。尤其是判決書上載明「嫌犯患有思覺失調症，依照兩公約不一判處死刑」，更是讓網路論述相當不平，甚至有法官投書認為「智障不應當官」。媒體還特別訪問了「湯姆熊隨機殺人案件」的受害者家屬，讓她提供了受害者家屬應有的姿態：「痛罵了」司法制度，說台灣「早已廢除死刑」。

---

<sup>8</sup> 內容取自 PTT HatePolitic 板貼文 <https://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463114662.A.346.html>  
本研究有些貼文因看板 Gossiping 會定期刪文而遺失，因此檢附其他看板的轉錄文。

<sup>9</sup> 內容取自 蔡正元 FB：  
<https://www.facebook.com/tsaichengyuan/posts/1210682492306008>

<sup>10</sup> 內容取自 王欣儀 FB：  
<https://www.facebook.com/love.cindy.club/posts/1167699649951499>

這些關於受害者的論戰，說穿了就是維護邪僻主體的自我恭賀狀態的行動。如同本章節開頭所引用的事隔兩年的推文可看到，小燈泡媽媽的立場詭異的破壞了邪僻主體的戲碼，因此邪僻主體騷動著，質疑他「不愛小孩」、「不是好媽媽」、「犧牲小孩換取從政」...，這一切都只是嘗試維護著想像性律法的至高無上，而重複著那句低語：「他們就是我想像的這麼壞！」

在上述整理的這些網路論述中，我們可以看見，隨著案件發生的當下，這套對抗邏輯被強迫性的拉扯了出來。這並不單純是先發制人的行為，這也是創傷的時刻，也是強迫性重複的邏輯再次運作的時刻。我們激烈的討論、我們責怪兇手，但我們卻又時時刻刻害怕著來自內部的恐懼。什麼時候會終結這種事？誰可能是下一個兇手？我們沒有頭緒，只好將質疑停留一個民粹主義的階段，狩獵一個祭品，獻祭給神明。而這段過程變成了我們象徵化這樣的恐懼的方法，也就促使著強迫性重複症狀反覆發作。

而這些論述，除了顯現出廢除死刑的議題，隨著先發制人「免疫危機」邏輯對抗快感迴圈的構成之外，更能顯示出這些論述之中隱含的社會想像。

先看看這兩段推文<sup>11</sup>：

推 XXXXXXXX: 這種等級的精神病送毒氣室撲滅我覺得符合社會最大利益  
→XXXXXXXX: 益

→\*\*\*\*\*: 應該立法讓社會矚目案件所有卷證去除家屬識別資料後

→\*\*\*\*\*: 上網公告變 opendata

→\*\*\*\*\*: 鄭捷早已接受了高規格的精神鑑定,其他人還要重覆鑑定

→\*\*\*\*\*: n 次嗎?

→\*\*\*\*\*: 對疾病做研究不需要每個研究者都去抽幾管血重覆驗相同

→\*\*\*\*\*: 項目吧,病歷調出來看就好了,當然古早年代有些研究者會

→\*\*\*\*\*: 多留幾管血冷凍起來,等待將來有新的檢測技術時檢測

→\*\*\*\*\*: 現在的受試者和個人資料保護恐怕比較難允許這種行為

再看看這篇文章：<sup>12</sup>

1.那些深具悔意的犯罪者，就該以行動表示悔意，自願活割器官，以器官販售金額補償被害人。例如擔心女兒心臟病就虐殺人強姦人妻的菲勞，就應該活割器官，一半的錢再給他女兒治病。

2.如果不具悔意，就應該招標來做人體實驗，實驗幾次以後，再進行凌遲處

---

<sup>11</sup> 第一段推文來自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06410080.A.CE8.html>

第二段推文來自 <https://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463114662.A.346.html>

<sup>12</sup> 文章來自 <https://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466612966.A.9D1.html>

死，全國轉播。

3.酒駕撞死人者、精神耗弱殺人者，既無犯意又需要治療：

(1)能賠償被害人 2400 萬以上者(參考美國的生命價值估計)，拿錢出來，可免酷刑。

(2)精神病者從事人體實驗，酒駕嗑藥者從事奴隸工作，透過炎夏綁鐵球鋪馬路去除體內酒精藥物殘留，直到他自己或家人拿錢來贖，如不聽從工務單位調遣，則提供羅馬競技場娛樂，讓他以血來歡樂大眾，門票給受害人及家屬。

什麼是人權？他媽的奉公守法的一般人不能安心，受害不能得到補償時，根本就沒有人權討論空間。

有錢判生，沒錢判死本來就是真理，但這錢應該是花在受害人家屬與國庫，而不是喪盡天良的律師與讀書讀壞腦袋，遠離人民的法律人。

這些都是 PTT 看板上反對廢死的文章，而我只是取幾個比較說法比較誇張的例子來方便說明，但其實在當下，這樣的論述充斥著整個網路。

這些說法推崇 著 的是一個嚴刑峻法的社會：主張速審速決、擁抱監視、建構出一套社會「太過注重人權」所以「治安太差」、精神疾病其實都是「脫罪之詞」「社會問題」等等的論述。

這些論述對於與犯罪防治、教育、心理、法律等與隨機殺人可能較相關的領域 一點關係也沒有（即使有，也是反智的），這些論述 只是陳述一種相對於現在更能解決犯罪的社會狀況，但 完全沒有意圖要檢討這個社會，就只是想像而已。

但是這套想像出來的社會，對於「競爭」這件事，往往還是相當接受，如同第三個例子所點出的，「有錢判生，沒錢判死本來就是真理」，這套對於社會的想像，對於司法改革毫無幫助，反倒是令人想起 Foucault（1992）在《規訓與懲罰》中描述的酷刑場景：

一七五三年，達米安因謀殺國王被判處「在巴黎教堂大門前公開認罪」，...，那裡將架起行刑台，用燒紅的鐵鉗撕開他的胸膛和四肢的肉，用硫磺燒焦他持著弒君凶器的右手，將融化的鉛、沸滾的松香、蠟和硫磺交入撕裂的傷口，然後用四馬分屍，再焚屍揚灰。...

酷刑這件事，本身具有的意義其實是「絕對權力的展現」，透過讓犯罪者自身成為罪刑的宣告者、用痛苦讓他懺悔、並將罪行與刑罰連結起來、讓司法有個儀式性的結束等，權力在儀式中得到了展現。但這些展現，其實也是權力並無法有效統治的象徵。隨著權力的統治技術發達，刑罰也因其暴力性質，漸漸隱身於權力機器背後。

從 Foucault 的文字中，短暫的借用了這個頗具畫面感的文字場景，其實還有一層含意：酷形的場景、嚴刑峻法的世界觀，這畫面無疑就是強迫性重複的精神官能症結構內，幻見所展示的慾望場景。這樣的場景，支撐了社會走過這段煎熬的時間，卻也將社會帶往了民粹主義的極端道路。Zizek (1989) 曾提到，幻見的意識形態作用是需要注意的。心理病症，往往不指是個人的病理問題，而是涉及到社會整體結構的運作。當我們譴責了兇手、聲明反對了犯罪時，我們可能也正在享受著病態的快感，攻擊著那些無辜的人，無視我們真實的問題。Lacan 如是說：「人人都是精神病患，我們只不過是那些衣冠楚楚的罷了。」

## 五、結語

房間若出現蟑螂時你會踩死蟑螂 或是你會趁此機會  
開始 將房間好好的整理一遍 還是 罵不殺生的人然後繼續睡  
別太鄉愿 你至少該邊打蟑螂邊將你房間整理  
不整理房間 髒亂還是在你的旁邊 無法解決問題  
迷失 陷入死刑或攻擊廢死這迷思 其實 背後真正問題無法被抑制  
警局前打嫌犯喊司法已死 慘劇更無法停止 聚眾警局打人才真的叫司法已死  
大支，〈扣板機〉。收錄於《硬》專輯。

本研究首先以恐怖主義相關的理論作為開始，首先引介了 Massumi 的討論恐怖主義影響下的一種「先發制人」的行動（Preemptive action）。威脅缺乏「實質指涉」的客體，催化了無限上綱的「自我防衛」，恐懼與威脅「永遠」潛伏在四周，因而，永遠的先發制人是必要的。

接著，本研究結合了 Derrida 論述的「自體免疫過程」，嘗試更具體的構築恐怖攻擊與「威脅」、「恐懼」這樣的情感結構。「他者」變成內部的、全面性的、無臉孔的對象，威脅與恐懼卻更加具體，所謂的「自體免疫危機」，即展開一場「對抗自己的戰爭」。為了周全自身而對他者造成的傷害，勢必將化為更多對於自身的傷害。而這傷害的循環，便是自體免疫的最大危機。

這樣的結合，結構出關於一套「過度行動」與「恐懼情感」邏輯。而我接著便指出恐怖主義與隨機殺人最根本的不同：對象，而這差異也導致了這些先發制人激烈行動與自體免疫危機，如何的在台灣的脈絡轉化為市民社會在網路上那些過於激烈的論述。

本文理論的另一部分，則是轉換角度，討論「對抗」框架在一些狀況中，意識形態封閉（ideological clouse）的模式，加劇僵化的社會對立。張維元描述主體在對於想像性律法的拜物性取用之後，逃脫了罪咎感，成快感倒錯的邪僻主體，轉而藉由互不對話的僵化對抗汲取快感，沉溺在單面解讀之中。

藉著 Freud 提出的強迫性重複的精神官能症此一概念，筆者試圖指出 當情感隨著事件爆發出來，會催化對抗邏輯，將之轉變為平行共謀式對抗，而將整體結構捲入「強迫性重複的精神官能症」的病理結構中，也就形成了新的快感迴圈。

「小燈泡事件」的網路爭議中，重複出現的論述中，隱含著推崇一種嚴刑峻法的社會。這樣的想像其實就是強迫性重複的「幻見」，對於恐懼清楚的防衛機制，轉而將主體導向了另一個極端。這些隨著隨機殺人行伸出對廢死爭議的爭論，事實上卻是轉移了對於隨機殺人事件，也就是「創傷」本身的焦點。但是，卻又可以清楚地體認到，恐懼可說是無所不在，一直都在「將臨」。

本研究希望指出的，便是在所謂的「民主」社會的中存在的荒謬現象：面對威脅時的防衛機制，構成了一套由恐懼與快感邏輯運作的民粹主義。情感一

直是一個需要深切探討的面向，本文希望藉由初步的將情感的帶入政治理論，能夠發掘情感的政治潛力。

但，提到民粹主義，其實這個詞對於台灣人應該不算陌生，因為總是有政治人物用這個詞來攻擊對手的政策。但在許多時候，這或許是個讓我們較難以辯駁的論調，畢竟重視「多數決」的社會，如何能不「民粹」？但本文開展的面向，是希望透過一個確切發生在台灣脈絡的案例分析，帶來這樣的討論與反思。別忘了，除了恐懼是「將臨」的，民主也是”to come”的。

結語的引文算是呼應一下本文開始那段 Zizek 關於民粹主義的文字，以大支的歌詞中用蟑螂譬喻隨機殺人事件的段落，與 Zizek 提到民粹主義中那「否定、拒絕面對事物複雜面之特性」的笑話相映襯，顯示出這案例本身的荒謬。

蟑螂這樣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生物，其實某種程度上可說是「現代性的黑暗面」，象徵著繁華的城市空間背後的髒污。叢林中的蟑螂哪會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城市中的蟑螂，因為「理當乾淨整潔的現代性中，怎可以有這樣非現代、非理性的存在」？

面對蟑螂而驚嚇不已的居民，便是本文論述中的「邪僻主體」的寫照。隨機殺人者便是這現代性的黑暗面，隱身於你我之中。陌生的落單路人、不熟悉的單身鄰居，全都可能是隨機殺人犯，這就是城市生活的黑暗寫照。恐懼將臨，近的彷彿只有肩膀與肩膀的距離。

鄭捷出現了，那就殺死牠吧，像是屋裡那隻蟑螂一樣。至於骯髒的碗盤，還是明天再說吧。

## 參考書目

### 中文文獻：

- 朱元鴻等譯，2003。《波灣戰爭不曾發生》（原著：Jean Baudrillard）。台北：麥田。
- 沈志中，王文基譯，2000。《精神分析辭彙》（原著：Laplanche and Pontalis）。台北：行人出版。
- 查日新，2007。〈抵禦民粹主義誘惑〉（原著：Žižek, Slavoj），《國外理論動態》2007:Vol. 9。
- 張維元，2015。〈共謀式對抗的快感新陳代謝〉。文化研究，第 18 期。
- 張維元，2016。〈補教介入高中生自我建構的情感、知識與資本：一個初探性的研究〉。國家發展研究學會（主編），《性別·身體·文化 凝視與召喚》（P.25~47），巨流出版社。
- 許寶強，2014。〈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為香港「新自由主義」「埋單」〉，《人間思想》，6，81-100。
- 黃冠華，2013。〈幻想與旁觀他人之痛苦：媒體感官消費的精神分析考察〉。新聞學研究，第 116 期。
- 黃冠華，2015。〈一個矛盾的網路主體：能述、幻想、互卸〉。中華傳播學刊，27，203~226。
- 楊韶剛 譯，2000。《超越快樂原則》（原著：Freud, Sigmund）。臺北市：米娜貝爾製作。
- 葉佳怡譯，2015。《恐怖時代的哲學》（原著：Borradori, Giovanna）。台北：南方家園。
- 劉北成譯，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原著：Foucault, Machel）。台北：桂冠。
- 劉紀蕙等譯，2009。《拉岡精神分析辭彙》（原著：Evans, Dylan）。台北：巨流。
- 蔡淑惠譯，2008。《傾斜觀看》（原著：Žižek, Slavoj）。台北：桂冠。

### 英文文獻：

- Dunmire, Patricia (2005). Preempting the future: rhetoric and ideology of the futur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Vol 16(4):p.481~513.
- Laclau and Mouffe (1989).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 Massumi, Brian (2010). *The Future Birth of the Affective Fact: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Threat*.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London.
- Ziz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Zizek, Slavoj (1997)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London: Verso.